

外来语成分的概念隐喻及其叙事功能——以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为中心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Foreign Lexical Elements: A Study Centered on Eileen Chang's *The First Incense Burner* and *The Second Incense Burner*

孔薇涵，曾梦芯

广州理工学院

摘要

张爱玲小说语言中的外来语成分，既是其个人语言风格的标志，也是理解其叙事策略与文化立场的线索。以《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为对象，在统一界定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两篇小说中的音译词、借译词与欧化表达，并借助概念隐喻理论，对其类型分布、隐喻模式及叙事功能加以分析。研究采用“六步判定法+排除规则+多例互证”的程序，以可查核的原文语境为证据，力求降低隐喻判定的主观性。研究发现，两篇小说在外来语成分的类型与分布上存在差异：《第一炉香》侧重社交场景与生活物件类词语，《第二炉香》则明显增加制度性、法律性词汇，呈现由“社交展示”向“制度约束”的转移。在认知层面，文本中较为稳定地存在“社会阶层是容器/圈层”“价值取向是可占有之物”“社会地位是垂直高度”三类核心概念隐喻；在叙事层面，人名音译、称谓音译与场景词通过命名与场景建构，将人物嵌入殖民社交网络，并与冷静、疏离的叙述风格叠加，使殖民地上层生活以近乎标本的方式呈现。外来语成分由此既是语言欧化的表层标记，也是参与人物塑造、阶层区隔与殖民现代性显影的认知与叙事资源。

Abstract

Foreign lexical elements in Eileen Chang's fiction are both a hallmark of her linguistic style and a key to her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positioning. Taking *The First Incense Burner* and *The Second Incense Burner* as its objects, the study compiles transliterated loanwords, calques and Europeanized expressions under a unified set of criteria, and draws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o analyze their distribution, metaphorical patterns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A procedure combining a six-step identification metho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multiple-instance validation is adopted, with verifiable textual contexts as evidence, so as to reduce subjectivity in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The two works differ in the type and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elements: *The First Incense Burner* emphasizes vocabulary of social scenes and material objects, whereas *The Second Incense Burner* shows a marked increase in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terms, indicating a shift from social display to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At the cognitive level, three recurring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identified, namely SOCIAL CLASS IS A CONTAINER, VALUE ORIENTATION IS A POSSESSABLE OBJECT and SOCIAL STATUS IS VERTICAL HEIGHT. At the narrative level, transliterated personal names, address terms and scene words embed characters within colonial social networks and, combined with a cold and detached narrative voice, present upper-class colonial life in an almost specimen-like manner. Foreign lexical elements thus serve both as surface markers of linguistic Europeanization and as cognitive and narrative resources participating in characterization,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关键词：张爱玲；沉香屑；音译词；欧化表达；概念隐喻；殖民现代性

Keywords: Eileen Chang; Chenxiangxie; Transliterated Loanwords; Europeanized Expressions; Conceptual Metaphor; Colonial Modernity

一、引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历来被视为“中西杂糅、雅俗并存”的典型。其语言魅力不仅源于细腻的叙事与对人性的洞察，也来自独具特色的词汇与句法选择。《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以殖民地香港为叙事空间，在人物对话与叙述层面频繁出现外来语成分——既包括外籍人名、称谓与物品的音译词，也包括“……主义”“社会圈子”“离婚律”一类的借译词与欧化表达。这些成分并非单纯的语言装饰，也不只是简单的词汇借入，而是在语音形式、文化联想与社会身份意义等层面共同作用，成为张爱玲塑造人物、呈现社会场景与表达文化张力的语言资源。换言之，外来语成分在两篇小说中承担的，远不止“指称异域事物”这一基础功能。

按照莱考夫与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人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往往依赖于将其映射到具象的经验结构之上（莱考夫、约翰逊，2015）。语言并不只是命名现实，也参与建构现实。外来语成分在保留原语语音色彩与文化背景的同时，往往把现代性、阶层、身体经验与欲望等抽象概念以隐喻的方式带入文本，从而形成“现代/落后”“体面/堕落”“圈内/圈外”等文化框架。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分析两篇小说中的外来语成分，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可以把“张爱玲语言洋化与混杂”这一长期停留于宏观印象的判断，转化为可观察、可统计、可复核的具体语言现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其语言选择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叙事策略，进而理解殖民语境中语言、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关联。

就研究现状而言，已有成果可大致归入三个方向。其一是外来词与汉语欧化现象研究。杨锡彭从语言学角度系统梳理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分类、语音适应与语法整合规律，指出外来词不仅是词汇层面的借入，也承载文化传播、现代观念输入与社会身份建构功能（杨锡彭，2007）；王力很早便指出，现代汉语在词法与句法上受到印欧语影响，形成了系统的“欧化的语法”现象，这一判断为理解外来成分在语言系统内部的渗透与整合提供了基础（王力，1985）。其二是张爱玲语言风格研究。学界普遍注意到，张爱玲频繁使用“……主义”“……性”“……式”等欧化词缀与欧化句式，形成独特的语言节奏与叙述风格；贾荃册即认为其语言由传统白话、文言与欧化成分三者综合而成，外来语言因素不仅改变句式结构，也改变意义表达与审美取向（贾荃册，2013）。其三是殖民语境与文化身份研究。赵稀方考察了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分析其如何通过语言书写殖民地的“凝视”与阶层焦虑，揭示出语言在殖民语境中作为身份、权力与阶层象征的功能（赵稀方，2018）。

尽管成果较为丰富，已有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一是多停留在整体印象式概括，对具体语料缺乏系统梳理与类型化统计；二是较少将外来语成分这一具体语言现象与概念隐喻理论直接对接；三是对外来语成分如何参与人物塑造与文化身份建构，讨论尚不充分；四是针对《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这两篇殖民语境鲜明、外语成分突出的作品所作的个案分析，尤显欠缺。在文学研究领域，格鲁特曼（Rainier Grutman）指出，文学文本中的语码转换与外来语往往具有“舞台化”（staged）的特征，并非对现实语言环境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叙事策略与身份建构手段，参与建构人物社会关系、文化位置与意识形态结构（Grutman, 2024）。这一判断为把外来语成分纳入叙事功能分析提供了依据，但目前将“概念隐喻”与“外来语成分”结合起来、并落实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仍不多见，这正是本文试图填补的空间。

基于上述空白，本文以两篇小说为对象，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在统一界定标准下，两篇小说中外来语成分的类型与分布如何，又呈现出怎样的差异？第二，这些成分在语境中触发了哪些概念隐喻类型？第三，它们在人物塑造、叙事推进与殖民语境呈现中承担何种功能？这里需作一限定：并非所有外来语成分均构成概念隐喻，本文重点分析能够触发跨域映射的外来语成分，其余则主要讨论其叙事功能。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文本细读、语料分类与概念隐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可查核的原文语境为证据基础，在主观解读与客观语料之间保持合理张力。全文结构如下：首先说明理论框架、界定标准与研究流程；其次梳理外来语成分的类型与文本分布；再次依结构、本体、方位三类隐喻展开识解与阐释；最后回到文学层面，讨论其叙事功能与殖民现代性意涵。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概念隐喻理论与三种隐喻类型

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自理查兹（I. A. Richards）的互动理论以来，隐喻研究已逐渐超越单纯的修辞层面，转向意义生成与认知机制（Richards, 1936）。莱考夫与约翰逊进一步主张，隐喻并非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它深植于人类的认知结构之中，影响思维方式、社会观念与文化理解。隐喻通过“源域—目标域”的系统映射，把熟悉、具象的经验结构投射到相对抽象的社会概念、情感经验与文化结构之上，从而构建意义。

依据这一理论，隐喻大致可分为三类，本文的分析框架亦由此建立。其一是结构隐喻，即以一種概念去系统地建构另一种概念，使后者的诸多方面都能借前者得到理解；在本文语料中，“社会阶层”被借“容器/圈层”加以建构即属此类。其二是本体隐喻，即把抽象的经验、活动、情感或观念视为离散的实体或物质，使之可被指称、归类、量化乃至占有；语料中“价值取向”被名词化为“……主义者”一类可指认的人格属性即属此类。其三是方位隐喻，即依据“上/下”“内/外”“前/后”等空间方位组织概念系统；语料中“社会地位”被理解为垂直空间中的“高/低”即属此类。三类隐喻并非彼此孤立，而常在同一语段中交织协同，共同建构文本的意义结构。

（二）从“欧化”到“认知输入”：理论的对接

既有的汉语欧化研究多聚焦于语音适应、词汇借入与句法结构的变化，揭示了外来语言成分在语言系统内部的整合规律。然而，外来语成分进入文学文本之后，其作用并不止于语言层面的“平移”。在《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所建构的殖民语境中，语言与权力、身份与欲望关系密切，外来语成分往往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西方文化象征以及阶层标识紧密相连，其所触发的文化联想本身即具有隐喻意义。换言之，外来语成分不仅是词汇层面的借用，更是一种“认知输入”：它把一整套源自西方的经验框架——西式社交、酒店聚会、法律程序、消费物品、社会分层——带入读者的理解过程，并以此为来源域去组织对抽象社会关系的认知。把概念隐喻理论引入外来语成分的分析，正是要把这种“认知输入”显题化，使语言风格研究与文化意义阐释得以对接。

需要说明的是，隐喻判定带有一定的解释性，如何降低主观随意性是方法论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在外交话语等领域引入系统化、流程化的隐喻识别程序，并将隐喻表达归入结构隐喻、方位隐喻与本体隐喻等类型，有助于减少研究者在判定过程中的随意性，为概念隐喻的实证分析提供方法学支撑（Wang & Chen, 2022）。在隐喻识别的方法论上，国际学界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程序：普拉格雷兹小组（Pragglejaz Group）提出的隐喻识别程序（MIP），主张以“语境义与基本义的对比”为判定核心（Pragglejaz Group, 2007）；斯廷（Gerard J. Steen）等在此基础上扩展出更为标准化、可操作的 MIPVU（Steen et al., 2010）。本文借鉴上述思路，将“语境义—基本义对比”的判定精神与概念隐喻的类型框架相结合，建立一套面向文学文本细读、可操作且可复核的判定流程（详见本节第五部分）。不过，该流程是一种适配文学语境的“隐喻分析”程序，重在阐释外来语成分如何在语境中触发跨域映射，而非对 MIP/MIPVU 的机械套用；其判定结论仍以完整的语境证据链与多例互证为依据。

（三）外来语成分的界定与纳入、排除标准

依据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的界定，外来词也叫借词，指从外族语言中借来的词，按借入方式可分为音译词（如“沙发”）、意译词（如“电话”）、音意兼译词（如“浪漫”）等（黄伯荣、廖序东，2017，第 276 页）。本文所称“外来语成分”在内涵上与之基本一致，但考虑到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在操作层面进一步纳入具有明确外语文化指向的欧化表达，以覆盖小说中更为丰富的语言现象。

为保证研究对象可操作、可一致，本文遵循以下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有三：（1）保留明显外语语音转写痕迹的词汇，即在形式上清晰体现外来语来源、具有较强语音仿拟或音节对应关系、而非完全汉化者；（2）具有明确外语文化指向或现代性象征意义的词项，此类词语往往与消费文化、日常交往方式、社会身份称谓及现代都市生活密切相关，能够体现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张力与身份意识；（3）能够在语境中承担语义或叙事功能的词项，即并非简单的引用或附属成分，而是在人物言语、叙事声音或社会氛围建构中发挥作用者。排除标准亦有三：（1）已完全汉化、使用者不再感知其外来属性、且已进入现代汉语核心词汇体系的词汇；（2）仅有概念借用或意义借译、而不保留语音痕迹的偶发表达；（3）

语境功能极弱、对人物意义或叙事结构无实质贡献的偶然词汇。通过上述标准,可确保所选语料具有明确的外语属性、文化指向与功能价值,为后续分类统计与隐喻分析奠定基础。

(四) 语码转换与借词的概念区分

在文学文本中,外来语言成分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需加以区分。语码转换指在同一段话中切换语言系统,主要体现在句法层面的中英夹杂;音译词或外来语成分则是词汇层面的借入(借音、借形、借意),二者并不等同。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对外来词与借词作过细致区分,强调外来词是“本语言的词”,借词是“借用外语的词”(高名凯、刘正琰,1958)。两类现象都可能产生“身份展演”或“阶层标记”的效果,但《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在文本表层很少出现完整保留外语形式的句法层语码转换,其外语因素主要落在词汇层面。因此,本文的核心材料以词汇层面的外来语成分为主,句法层面的语码转换不在重点讨论之列。

(五) 语料来源、版本与研究流程

本文以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张爱玲作品集》所收《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1997a,第1—70页)《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1997b,第71—119页)为语料来源,统一选取该稳定文本,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可复核性。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涉及外来语成分的段落进行重点标注,建立小型文本清单,记录词项形式、出现篇名与页码、语境语句、说话人或叙述者身份、语义领域及初步判断的功能倾向等信息,为后续统计分析与个案讨论提供规范依据。

在隐喻判定环节,本文遵循固定的“六步法”,以保证分析的可操作性与可复核性:第一步,摘录原文语境,连同前后各句一并录入,避免断章取义;第二步,说明该词项在表面句意上的含义;第三步,确定目标域,即作者实际评价的抽象概念,如阶层、体面、欲望、婚姻、道德、现代性焦虑等;第四步,确定来源域,即外来语成分把读者带入的具体框架,如西式社交、酒店聚会、法律程序、消费物品等;第五步,写出关键映射句,把目标域如何被建构为来源域的关系表述清楚;第六步,统计证据链,将语言证据与结构证据逐一列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多例互证”为补充原则:只有当某一映射在多个词项、多处语境中反复出现时,才将其归纳为相对稳定的概念隐喻,以尽量避免“孤证定论”。

与此同时,本文设定明确的排除规则:若某一外来词仅用于“报场景、报专名、报物品”,并未被用来理解某一抽象对象,则更接近“身份标记”或“场景道具”,不计入概念隐喻个案,而转入叙事功能讨论。这一区分尤其用于处理两类情况:其一是约定俗成的专名(如外籍人名、地名),它们一般不触发概念隐喻,主要发挥场景标识与身份归属功能;其二是词项在特定语境中被用于描述抽象关系或价值判断,此类才纳入隐喻分析。下文的表2即体现了这一区分。

三、外来语成分的类型与文本分布

(一) 类型划分与A、B两类的区分

结合语料与文本语境,并参考外来词研究的既有分类(杨锡彭,2007),本文将两篇小说中具有外来文化语义背景及音译、欧化性质的成分划分为七类:(1)人名音译,以语音转写为主的外籍人名;(2)称谓音译,表示身份、头衔、社会角色的外来称谓;(3)物品音译,对具体事物、饮品、空间等的语音转写;(4)借译,直接借用外来概念、形式已高度汉语化者;(5)意译,以汉语意义翻译外来概念;(6)半音半意,部分保留外语语音、部分采用意译;(7)欧化表达,并非单个外来词,而是体现西式思维、制度或话语结构的表达。划分依据有二:一方面覆盖文本中实际存在的外来语成分的主要形式来源;另一方面各类别相互排斥,同一词项原则上只归入一类,以保证统计的互斥与完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欧化表达”(第七类)与其余六类在性质上存在层次差异:前六类侧重词项的形式来源(语音、语义等),欧化表达则侧重语用层面的文化输入。因此,在隐喻分析中,其作用机制与前六类略有不同——它往往不依赖单个词的外来形式,而是通过整体的话语结构或概念框架完成“认知输入”。基于这一差异,本文在呈现词项时进一步区分A、B两类:A类指保留明显外来语来源痕迹、或

可追溯英语 / 西语文化语源的词项；B 类指虽非严格意义上的“音译词”，但具有明确现代西式文化语义、身份标签化与欧美文化引入背景的“拟外语词”或“欧化词”。这一区分使后续的分类与功能分析既能照顾形式来源，又能容纳语义、语用层面的外来性。

一个值得注意的总体特征是：两篇小说并未大量使用直接拼音式的英语音译词（如直接保留 party、dance、boy 等形式），其外语现象更多呈现为语义层面的“外来化”与文化意涵的移入——社交场域的“现代性氛围”、人物身份与价值观的“舶来标签”等，均通过借译、意译与欧化表达完成。可以说，张爱玲并非简单地模仿外语语音，而是通过选择性地引入外语文化语汇与欧化修辞结构，建构出具有殖民香港特质的语言世界。这一发现表明，其外语因素的引入并非表层点缀，而是深层文化结构的移植与重构。

表 1. 两篇小说中外来语成分的可查核分类

词项	篇目	页码	类型	语源 / 说明	语境关键词
园会	一	29	借译	英式 garden party 的延续	上流社交 / 公共聚会
物质主义者	一	46	欧化表达	欧化思想标签词（-ism 结构输入）	价值判断
拜金主义者	一	61	欧化表达	欧化思想标签词（-ism 结构输入）	价值判断
爵士	一	7、9	称谓音译	英语 sir，英国爵位制度称谓	社会尊称 / 权力象征
香港饭店	一	66	借译	现代都市空间消费词	社交 / 消费场所
鸡尾酒 / 威士忌	一 / 二	36/82	物品音译	英语 cocktail / whisky	社交聚会 / 宴饮
香港社交圈	一	31	欧化表达	英语 social circle 概念	关系网络 / 社交边界
汽车	一 / 二	42/118	借译	近代工业文明输入概念	现代交通
罗杰	二	72	人名音译	英语男性名 Roger	外籍男性 / 社交场合
太太	二	73	欧化称谓	对应 Mrs.	已婚女性
蜜秋儿太太	二	73	人名音译	Mrs.+ 姓；Mitchell	殖民社交圈 / 已婚女性
麦菲生（太太）	二	111、113	人名音译	苏格兰姓氏；McPherson	殖民社交圈
毛立士太太	二	114	人名音译	英语姓氏；Mrs. Morris	殖民社交圈
巴克	二	109	人名音译	英文名；Buck	外籍男性 / 社交场合
克荔门婷	二	71	人名音译	英语女性名；Clementine	外籍女性
婚礼进行曲	二	79	半音半意	英式婚礼音乐 Wedding March	婚礼仪式 / 西式婚姻
照相 / 拍照片	二	86	半音半意	近代西方影像文化	婚礼记录 / 现代仪式
网球场	二	86	借译	tennis court	休闲活动
旅馆	二	107	借译	英语 hotel 所代表的西式住宿制度	城市生活 / 流动居所
英国离婚律	二	110	意译	British divorce law	婚姻制度
协议离婚 / 分居	二	111	意译	英美婚姻法体系	婚姻制度
普通的人	二	95	欧化表达	英语 normal 概念的输入	社会规范 / 群体参照
社会圈子 / 圈子外	二	104	欧化表达	英语 social circle 概念	社交边界 / 关系网络
中等以上社会	二	104	意译	British social class system	阶层划分 / 社会评价

注：篇目栏“一”指《沉香屑·第一炉香》，“二”指《沉香屑·第二炉香》；页码依花城出版社 1997 年版《张爱玲作品集》。

（二）两篇小说的分布差异及其叙事意涵

就分布而言，两篇小说呈现出明显差异。《第一炉香》的外来语成分更集中于社交场景与生活方式相关词项，如“园会”“香港饭店”“鸡尾酒”“网球场”等，其功能主要在于快速搭建殖民地香港上层社交生活的语境，使读者即刻感受到一种“现代”“体面”“上流”的氛围。《第二炉香》则明显增加了制度性、抽象性与法律性词汇，如“英国离婚律”“协议离婚”“中等以上社会”等，叙事重心由“社

交展示”向“制度约束”转移。

这一分布差异并非随机，而具有深刻的叙事意涵，可视为两篇小说叙事策略差异在语言层面的直接映射。《第一炉香》以葛薇龙进入殖民地地上流社会、并在其中逐步沉沦为主线，外来语词更多服务于社交场景的快速建构，使阶层壁垒的存在一望可知；《第二炉香》则将叙事重心转向婚姻、制度与法律规范，写罗杰因新婚之夜的误会而被卷入流言、制度与舆论的合围，制度性词汇的增加正与这一“被制度碾压”的主题相呼应。由此可见，外来语成分并非装饰性的语言资源，而是随叙事主题的变化而调整其使用重点的功能性资源。下文将进一步说明，这种“随主题分布”的特征，在概念隐喻层面同样有所体现。须说明的是，受语料规模与人工标注方式所限，本文对分布的描述为定性归纳，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频次统计；表1所列为经界定标准筛选后的代表性可查核词项，而非穷尽式的频数清单。更精确的频次分布及其在两篇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有待在更大规模、可重复的语料标注基础上进一步检验。

四、概念隐喻的识解与阐释

（一）识别、判定与排除

本文在识别由外来语成分参与建构的概念隐喻时，始终遵循前述六步流程，并从结构隐喻、本体隐喻、方位隐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隐喻的判定并非仅依据词项是否具有外来来源，而是通过完整的语境证据链加以确认；只有在证据链完整、映射关系清晰的情况下，才判定其隐喻类型。若外来语成分仅起背景标注或叙事装饰作用，则不计入隐喻分析，而转入第五节的功能讨论。表2列出代表性词项的判定结果，其中亦保留若干“不计入”的案例，以展示排除规则的实际运用——例如“香港饭店”仅作为特定社交场所出现、“网球场”仅表示地点，二者虽带有外来文化背景，却未被用来理解某一抽象对象，故不纳入隐喻个案。

表 2. 代表性词项的概念隐喻判定

词项（页码）	语境关键词	目标域	来源域	隐喻类别	映射 / 注记
园会（一,29）	上流社交	社会阶层	西方制度化社交空间	结构隐喻	体面被理解为“能否入场”
香港饭店（一,66）	都市公共空间	—	—	不计入	仅作特定场所标识
鸡尾酒（一,36）	社交宴饮	社交关系	西方消费文化	结构隐喻	物品与社交身份绑定
网球场（二,86）	休闲活动	—	—	不计入	仅表地点，隐含阶层差异
物质主义者（一,46）	价值判断	人的价值取向	物质经济逻辑	本体隐喻	抽象思想被名词化处理
拜金主义者（一,61）	价值判断	道德立场	现代功利价值	本体隐喻	价值观被视为可识别对象
英国离婚律（二,110）	婚姻制度	婚姻关系	英国法律制度	结构隐喻	婚姻被理解为法律契约
协议离婚 / 分居（二,111）	婚姻制度	夫妻关系	空间分离	方位隐喻	情感破裂被理解为物理分开
社会圈子（二,104）	社交边界	社会位置	容器 / 空间	结构隐喻	“进入 / 排除”空间化
香港社交圈（一,31）	关系网络	社会归属与位置	容器 / 圈层	结构隐喻	圈内 / 圈外的进入与排除
中等以上社会（二,104）	阶层划分	社会等级	垂直空间	方位隐喻	社会地位被理解为高低位置
普通的人（二,95）	社会评价	社会身份	标准化分类	本体隐喻	抽象规范被实体化

（二）结构隐喻：社会阶层是容器 / 圈层

在两篇小说中，社会阶层并非通过抽象论述直接呈现，而是借助一系列外来语成分与场域词汇，被结构化为一个具有边界、入口与排斥机制的“圈层 / 容器”。在这一结构隐喻中，进入某一场域等同于

获得归属,无法进入则意味着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可概括为“社会阶层是容器/圈层”。

先看“园会”(《第一炉香》第29页)。小说描写葛薇龙初入香港社交环境,通过园会结识上层社会人物,叙述中多次强调她在场合中的拘谨与不安。从字面看,文本描写的是园会这一社交活动的出入、寒暄与过程;但叙事真正关注的,是葛薇龙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问题,即她是否被上层社交圈接受、是否具备“进入资格”。“园会”所触发的,正是西式社交场域的框架,而该框架天然包含“受邀者/非受邀者”“圈内/圈外”的区分。于是,文本将社会归属理解为“是否能够进入特定社交场域”的问题,读者也据此以“进入—排除”的空间逻辑去理解人物处境。叙述中对人物拘谨、局促以及旁观式语气的刻画,则提供了“尚未真正融入该圈层”的证据。

再看“社会圈子”(《第二炉香》第104页)。文本写罗杰“现在环境逼迫他,把他推到大众的圈子外面去了”,明确以“圈子”这一带有外来语色彩的概念性表达,指称人物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位置。“圈子”作为空间隐喻,来源于具体的物理容器或封闭空间概念,具有明确的内外边界;叙述中“逼迫”“推”等动词进一步把社会关系动作化、空间化。人物的社会身份由此通过“在圈内/在圈外”得以界定,而否定性的“推到……外面去”则直接指向空间排斥。

同属容器/圈层映射的,还有“香港社交圈”(《第一炉香》第31页)。文本称葛薇龙是“香港社交圈中的后起之秀”,“社交圈”(social circle)一词所激活的,正是一个有明确边界、可“入”可“出”的封闭区域,葛薇龙能否被这一“圈”接纳,决定其社会归属。须辨明的是,此例固然含“后起之秀”与“地位稳固”的高下意味,但该高下是由汉语固有的排序词语承担的,而作为外来语成分的“社交圈”本身触发的是“圈内/圈外”的容器图式,并非“上/下”的垂直方位;依本文“按外来语成分归类、不把母语固有隐喻误归于外来性”的原则,此例的可归因项是容器图式,故宜与“社会圈子”同归结构隐喻,而不计入方位隐喻。进一步说,这里的“圈/容器”并非仅把社会反观为一个实体,而是提供了边界、入口与接纳/排斥机制等结构性内容,用以组织“社会阶层”这一抽象领域,所借取的是容器的结构而非单纯的实体性,因而归入结构隐喻,而非单纯的本体(实体化)隐喻。

上述各例表明,社会阶层被系统地结构化为一个带有进入机制与排斥边界的空间体系。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映射并非由单一词项独立完成,而是通过“园会”“社会圈子”“香港社交圈”等外来语成分在文本中的反复共现得以巩固,使读者借助熟悉的空间结构去理解抽象的社会等级关系——这也正是“多例互证”原则的体现。进一步看,“园会”一处叙述还点明香港的园会“还是英国十九世纪的遗风”,并讥讽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却总是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这种带有殖民模仿(mimicry)色彩的反讽,使“容器”不仅是阶层的容器,更是殖民现代性的容器:进入它既意味着获得体面,也意味着被卷入一套对宗主国的拙劣模仿之中。结构隐喻“社会阶层是容器/圈层”由此与殖民语境的批评意识相互叠加。

(三) 本体隐喻:价值取向是可占有之物

在评价人物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形象时,文本并不展开抽象议论,而是通过评价性的外来语成分,把价值观念实体化为可指认、可归类、可贴标签的人格属性。在这一认知模式下,价值观念不再是流动的行为倾向,而被物化为一种“可以被拥有、被展示、被贴标签”的社会属性,可概括为“价值取向是可占有之物”。

以“拜金主义者”(《第一炉香》第61页)为例。梁太太戳着乔琪的指尖骂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拜金主义者!”这一称谓出现在总结性评价的位置,而非具体行为描写之后的解释说明,体现出一种直接定性的叙述态度。带有“-ism”(西文“-主义”)结构印记的评价标签,把原本抽象、流动的价值取向,转化为一个可被识别的人格类型,使读者不再从具体行为、而是从“是什么样的人”来整体把握人物形象。乔琪将与薇龙的婚姻当作金钱交易的筹码,其复杂的动机由此被凝缩为一个可命名、可占有的属性。

“物质主义者”(《第一炉香》第46页)同样如此。文本称梁太太“是个精明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并补叙其年轻时“独排众议,毅然嫁给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这里,“物质主义者”把“重视物质”这一抽象倾向凝固为稳定的思想标签,使其具备如同物品般“可拥有、可识别”的特性,在语境中无需进一步解释,即可被读者理解为对人物整体取向的评价。“物质主义者”“拜金主义者”这一类带“……主义者”后缀的欧化标签词,正是把价值判断名词化、对象化的典型语言手段。

“普通的人”（《第二炉香》第95页）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同一隐喻。文本写“原来靡丽笙的丈夫是一个顶普通的人！和他一模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人！”——“普通”本是一个描述性形容词，此处却被用作一种可归类的身份状态，使“普通”成为一种可被占有或无法摆脱的社会属性。三例共同表明，本体隐喻把流动的行为动机简化并固定为可命名的社会分类单位，使价值取向像一种随身携带的“标志物”，参与人物社会形象的建构。

（四）方位隐喻：社会地位是垂直高度

方位隐喻通过“上/下”“以上/以下”“高/低”等表达，把社会等级转化为可感知、可比较的空间高度。最直接的例证是“中等以上社会”（《第二炉香》第104页）。文本写罗杰面对“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不知有何话可说，“中等以上”与隐含的“中等以下”将社会划分为上下两个层级，社会地位由此被理解为垂直空间中的位置，相关词汇承担了明确的价值评判功能。

与婚姻制度相关的表达同样被纳入这一“高/低”评价体系。当文本写到罗杰一旦“立约分居”便不得不养活妻子、又“在香港不能立足，要到别处混饭吃”时，婚姻状态便通过“稳/不稳”“立足/不能立足”被纳入社会评价之中：婚姻的稳定被理解作为一种“维持高度”的状态，而分居或无法合法离婚，则暗示人物在社会评价体系中下移。相关描写常伴随压抑、受限与失去体面感的语气，显示其并非中性的制度说明，而是带有明确的价值落差。

由上可见，方位隐喻使社会等级不再只是抽象分类，而成为可直觉感受的空间高度，从而自然地参与人物价值判断与叙事张力的建构。它与前述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并行不悖：结构隐喻确立“圈内/圈外”的边界，本体隐喻把价值凝固为可识别的标签，方位隐喻则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位置叠加“高/低”的方向感。三者协同，使抽象的殖民地社会结构在语言层面得以具象化。

（五）隐喻类型的可观察倾向与方法论反思

综合以上分析，由外来语成分参与建构的概念隐喻呈现出一定的可观察倾向：结构隐喻多与社交空间相关，本体隐喻多集中于制度与价值层面，方位隐喻则常通过社会评价语汇得以体现。三类隐喻在文本层面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意义框架，使读者在认知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隐喻图式。

还须辨明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外来语成分的“外来性”与概念隐喻的“隐喻性”并不等同，二者的关联在不同个案中强弱不一，应分层看待，不可笼统地把一切隐喻都归因于外来性。其一，“……主义者”“……式”等带“-ism”印记的欧化标签词，其名词化、对象化机制本身即由西文词法输入，外来性与本体隐喻的“物化”直接相关，可视为强关联。其二，“英国离婚律”“协议离婚”“中等以上社会”等制度性借译、意译词，把英美的法律制度与阶层框架作为来源域引入文本，而这一来源框架在本土的婚姻、人际概念中并无现成对应，外来性在此承担了“提供来源域”的实质作用，亦为强关联。其三，“圈子”“上/下”一类空间—阶层映射，本是汉语固有的概念隐喻，其“外来性”主要体现为殖民语境对这些场域词的“舞台化”使用，而非词源对隐喻的直接激活。因此，本文对“外来语成分参与隐喻建构”的主张，在前两类中为强主张，在第三类中则审慎地限定为“殖民语境中外来语场域词作为既有空间隐喻的载体与触发情境”，以避免将一般性的母语隐喻误归于外来性。这一分层既是对研究边界的自我约束，也指明了外来语成分发挥隐喻功能的真正着力点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隐喻类型的归纳仅限于文本层面的描述性总结，并不据此推断作者意图或社会因果关系。从方法论层面反思，“六步判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隐喻识别的可操作性，但仍面临文学语境中隐喻判定的固有挑战：隐喻意义的触发离不开读者的认知参与，同一词项在不同读者、不同语境下的激活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以“多例互证”部分化解了这一问题——只承认在多处反复出现的映射；但对于语料规模有限的文本研究而言，结论的外推性仍需保持审慎。这一反思并不削弱分析的价值，而是指出了方法论上可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五、外来语成分的叙事功能与殖民现代性

前文主要讨论外来语成分在认知层面的概念隐喻建构作用，而并非所有外来语成分都具有稳定的隐喻功能。因此，本节进一步从文学叙事层面，讨论未纳入隐喻分析的人名音译、称谓音译及场景词如何参与人物塑造、场景建构及历史文化语境的呈现。这些专名性词项在语义上多为指称性表达，难以直接触发跨域映射，却在阶层区分与殖民语境的可见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参见表3）。

（一）人名音译与称谓音译的人物塑造功能

表 3. 外来语专名性词项的叙事功能

类别	代表词项	叙事功能
人名音译	克荔门婷、罗杰、巴克、蜜秋儿太太	以“外来性”将人物嵌入特定社交网络，无需背景交代即标示其文化与阶层归属
欧化称谓	太太、小姐、爵士	标示身份边界与权力关系，强调社交规范而非情感，拉开人物心理距离
场景词	园会、鸡尾酒、威士忌、网球场	作为“场景道具”搭建上层生活语汇场，使阶层差异在语言层面自然显现

《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中大量出现的外籍人名音译，如罗杰（Roger）、巴克（Buck）、克荔门婷（Clementine）、蜜秋儿太太（Mrs. Mitchell）等，并非仅用于区分人物身份，而是通过其“外来性”，直接把人物安置进特定的社交网络。从叙事角度看，这些人名往往由叙述者或本地人物用以指称外籍人物，多出现在社交场合的交流或婚姻讨论之中；其出现时的语气通常较为冷静、客观，缺乏情感渲染，形成一种带有距离感的第三者观察视角。

这种命名方式的效果是：人物无需长篇背景交代，便自然落入殖民地香港的外籍上层或混合社交圈，外来人名本身即构成一种社会标签，使读者迅速识别人物所属的文化与阶层网络。其结果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命名层面便已被区分——外籍人物往往处于规则制定者的位置，而本地人物则更多处于依附、试探或被评价的状态。例如《第二炉香》开篇借克荔门婷之口讲述故事，叙述者“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殖民历史的“凝视”与人物的外来命名彼此呼应，社交网络与权力结构在不经意间被勾勒出来。

与人名音译相比，欧化称谓——“太太”“小姐”“爵士”等对应的外来称谓形式——更直接地参与人物关系的建构。这类称谓通常由一方对另一方使用，多出现在正式社交场景或关系尚未亲密的阶段。从语气上看，它们常带有明显的礼貌性与制度感，表现为恭维、疏离或表面尊重，而非亲昵。如《第二炉香》中巴克问罗杰“你太太预备一同去吗”，又如罗杰嘱人“你扶一扶毛立士太太”，称谓本身并不传递情感，而是强调社交规范与身份边界。其叙事效果，往往是拉开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强化阶层差异与权力的不对等，使人物被牢牢置于某种既定角色之中。

（二）场景词与叙事氛围：冷感叙述与“标本式”呈现

园会、鸡尾酒、威士忌、网球场等外来语场景词，在文本中频繁出现，却极少被细致描写其物理细节。它们更像是叙事中的“场景道具”，一经出现，便迅速搭建起殖民地香港上层生活的语汇场。这些词项所指的并非普通的生活空间或物品，而是带有明确社会门槛的活动与场所；人物是否出现于其中、能否自然地参与其中，遂成为判断其社会资格的重要线索。通过这些词，张爱玲几乎无需解释阶层结构，阶层差异便已在语言层面自然显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场景词与冷感、讽刺叙述的叠加。园会、鸡尾酒等本应具有热闹、轻松氛围的场景，在文本中却常伴随冷淡、疏离甚至略带讽刺的叙述语气——如前引园会一段对香港社会“画蛇添足”的讥评，又如写梁太太与卢兆麟“各人手里擎着一杯鸡尾酒，泼泼洒洒的，并肩走了过来，两人都带了七八分酒意”，热闹场面被一种旁观式的冷静所中和。这种反差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一方面，场景词提供了“体面”“现代”“上流”的外在语汇；另一方面，叙述者却通过克制的描写削弱这些场景的情感温度，使之成为展示社会规则与人物位置的舞台。其结果是，殖民地上层生活并未被浪漫化，而是以一种近乎标本式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强化了文本对社会结构的冷静观察与隐含批评。

(三) 语言选择作为殖民现代性的“舞台化”

把上述功能放到殖民现代性的视野中,可以看到更深一层的意涵。在殖民地香港的特殊语境里,谁使用哪一种语言、使用哪一类称谓,本身便是身份位置的无声宣言。外来语成分在这一意义上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借用,成为叙事权力运作的关键符号资源:它既是人物借以确认或攀附社会位置的工具,也是叙述者借以区隔人物、显影殖民结构的手段。这一现象印证了格鲁特曼关于文学文本中语码与外来语具有“舞台化”功能的判断——语言的选择本身即是叙事意义建构的组成部分,而非对现实语言环境的被动记录(Grutman, 2024)。更进一步,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却“画蛇添足”“全失本来面目”的反讽,恰与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论殖民“模仿”(mimicry)的暧昧性相呼应:被殖民者对宗主国语言文化的摹仿“近似而非同一”,既确认了宗主国的权威,又在“失本来面目”的偏差中暴露其裂隙(Bhabha, 1994)。外来语场景词在张爱玲冷感叙述中的呈现,正是把这种模仿的尴尬“舞台化”的语言手段:它一面铺陈“体面”“现代”的舶来语汇,一面以克制的反讽揭穿其底里的空洞。

由此,前文的三类概念隐喻与本节的叙事功能得以贯通:外来语成分先在认知层面把抽象的社会结构具象化为容器、标签与高度,又在叙事层面通过命名、称谓与场景把人物嵌入殖民社交网络,并以冷感叙述完成对这一结构的“标本式”呈现。语言的欧化在张爱玲笔下,不只是风格的现代化,更是殖民现代性在文本内部的语言学显影:模仿、攀附、区隔与凝视,都被压缩进一个个看似中性的外来语成分之中。

六、结论

本文以《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为对象,在统一界定标准下梳理两篇小说中的外来语成分,并从概念隐喻与叙事功能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就类型与分布而言,两篇小说存在系统性差异:《第一炉香》以葛薇龙进入上流社会为主线,外来语更多服务于社交场景的快速建构;《第二炉香》将叙事重心转向婚姻、制度与法律,制度性词汇随之增加。分布差异是叙事策略差异在语言层面的直接映射,说明外来语成分是随叙事主题变化而调整使用重点的功能性资源,而非装饰性点缀。第二,就概念隐喻而言,文本中较为稳定地存在三类核心隐喻:结构隐喻把社会阶层建构为“容器/圈层”,本体隐喻把价值取向物化为可占有的人格标签,方位隐喻把社会地位理解为垂直空间中的“高/低”。三者相互支撑,使抽象的殖民地社会结构在语言层面得以具象化。第三,就叙事功能而言,人名音译与称谓音译通过命名把人物嵌入不同的社交网络,场景词则作为“道具”与冷静、疏离的叙述风格叠加,在不直接评判人物的情况下完成阶层区隔与价值暗示,最终把语言选择转化为殖民现代性的“舞台化”表达。

在方法与视角上,本文尝试以“六步判定法+排除规则+多例互证”的程序,把“张爱玲语言洋化与混杂”的宏观印象转化为可观察、可复核的具体分析,并将外来语成分研究与概念隐喻理论、殖民现代性问题对接,为同类型的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一种兼具可操作性与解释深度的分析路径。尤须强调的是,本文并不笼统地把一切隐喻归因于外来性,而是区分了三种关联强度:欧化标签词的名词化“物化”、制度性借译词对来源域的提供,是外来性发挥隐喻作用的真正着力点;而空间—阶层一类母语固有隐喻,外来语成分则主要充当殖民语境中的“舞台化”载体。这一分层有助于厘清以往研究中“欧化”与“隐喻”相混淆之处。

本文亦存在局限。其一,音译词与借译词在个别语料中存在边界模糊地带,其分类仍需结合更多历时语料进一步验证。其二,概念隐喻的判定不可避免地带有解释成分,“六步法”“排除规则”与多例互证只能降低而无法完全消除主观性。其三,所依据的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经过编辑整理,与原载《紫罗兰》1943年第5、6期的初刊本之间可能存在文字差异,本文未能就外来语词项作系统的版本比对,这是后续研究可以弥补的方向。未来研究可在三方面展开:一是将分析范围扩展至《传奇》其他篇目,考察外来语与隐喻模式是否具有整体一致性;二是引入不同版本或译本进行对照,观察外来语在不同文本形态中的处理差异;三是结合更大规模的语料库方法,对张爱玲小说语言的欧化特征作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在殖民语境与现代性问题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的背景下,对张爱玲语言的外来语维度作系统考察,不仅有

助于深化对其语言特色的认识，也为理解 20 世纪中期华语文学的语言混杂现象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个案。

七、参考文献

- 高名凯, 刘正琰. (1958).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文字改革出版社.
- 贾芸册. (2013). 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形成要素分析.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4(4), 89-92.
- 黄伯荣, 廖序东. (2017). 现代汉语 (增订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莱考夫, G., 约翰逊, M. (2015).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1980 年)
- 王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 商务印书馆.
- 杨锡彭. (2007). 汉语外来词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爱玲. (1997a). 沉香屑·第一炉香. 载于张爱玲作品集 (第 1—70 页). 花城出版社.
- 张爱玲. (1997b). 沉香屑·第二炉香. 载于张爱玲作品集 (第 71—119 页). 花城出版社.
- 赵稀方. (2018). 城市经验与殖民反省——吕伦与张爱玲的香港叙事. 名作欣赏, (8), 70-73.
- Bhabha, H. K. (1994).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p. 85 - 92). Routledge.
- Grutman, R. (2024). How literary texts “stage” code-switching.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60(1), 19 - 40.
- Pragglejaz Group. (2007). MIP: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metaphorically used words in discourse. *Metaphor and Symbol*, 22(1), 1 - 39.
-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en, G. J., Dorst, A. G., Herrmann, J. B., Kaal, A. A., Krennmayr, T., & Pasma, T. (2010). A method for linguistic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From MIP to MIPVU. John Benjamins.
- Wang, X., & Chen, R. (2022). Transl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Based on CRP mode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2(10), 2062 - 2071.

作者介绍

孔薇涵, 博士, 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教师, 特聘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语言风格学与文学语言研究。

曾梦芯, 广州理工学院本科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风格学。

资助基金

广州理工学院科研启动基金。基金编号 2023KYQ042 我国历代语言文字规划政策研究。